

第一部分

风雨兼程——五十年 南亚所历程

回顾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的 初创时期

彭盛琪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创建于1964年8月，当时名为“印度研究室”，1979年9月才扩建并改名为“南亚研究所”，研究对象也从原来以印度为主扩大到所有南亚国家。我曾在1964年到1984年的20年间断续从事所里的研究工作和担任所的领导。2014年是我所成立50周年，看到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取得今天的研究成果，我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回想我所初创时期的艰难历程，我也不禁感慨万千。这里，我愿意将我所亲历的川大南亚所初创期间的人和事做简要的回顾，算是从我的角度见证我所的一段历史。但是，我已年近90，记忆难免有误，请予谅解。

川大南亚所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外关系得到较大发展的形势下，党中央和国务院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决定在有条件的高等院校建立一批涉外研究机构的背景下创立的。当时，毛泽东主席曾经作出要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等人据此做了指示和部署，并经外交部、中联部、高教部等中央部门的协商研究，决定在四川大学成立印度研究机构。四川大学位于我国西南，与印度接近，因此把研究印度的机构设在四川大学。

将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重点放在印度，当然是因为它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与我国有长期的交往，在发展中国家、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又在地缘政治上对我国非常重要。这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印度研究机构的原因。当时，发展中国家中还没有一个专门的国别研究机构，其他都是按地区设立的研究，如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等。

四川大学接受了这个任务后，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由校长温建平亲自兼任印度研究室主任，着手筹建工作。

筹建印度研究室的时候，我正在四川大学化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听说学校要组建印度研究室，而且正缺少这方面的研究人才。我因为

当年读大学时学的专业是历史，1954年又被选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当时叫“马列主义学院”，我进校一年后更名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培养理论干部的一部学习，专业仍为世界史，学制2年，因此主动向学校提出，我在这方面有一定基础，愿意到印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学校很快就满足了我的这一愿望。

我不是第一个调到印度研究室的。在我之前，本校历史系教授、校图书馆馆长赵卫邦先生和本校历史系教师尹协祚同志已先期调来并已开始筹建工作。

这里需要提一提的是，赵先生和尹协祚两位同志对南亚研究所的前身印度研究室的筹建和初创时期的学术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赵先生作为在世界史和民族学方面造诣较深的学者，为印度研究室的筹建，以及以后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作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尹协祚同志为印度研究室的筹建和建立外部联系做了不少工作，也是印度研究室初创时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带头人。印度研究室创立不久的1965年，我们的第一部研究成果“印度的粮食危机”就是尹协祚同志执笔写出的，是一份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参考的调查报告。

学校领导对印度研究室的创建给予了大力支持，要人给人，要物给物。只要是适合从事印度研究的，可以从学校内任何单位调集，可以从毕业生中筛选最满意的留校进印度研究室工作。印度研究室第一批留校学生雷启淮（哲学系）、李德昌（哲学系）、曾向东（历史系）和张廷茂（经济系）就是从川大1964届毕业生中挑选来的。1965年又从经济系毕业生中挑选了何承金，从北京外贸学院分配来应届毕业研究生陈儒玉。他们后来都成了印度研究室和后来的南亚研究所的业务骨干，也是南亚所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研究员。后来，从外交部调来李了文同志。李了文同志长期在外交部亚洲司印度处和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他的到来更加强了我们的研究力量。在物的方面，学校在国家外汇稀缺的情况下争取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为我们订购大量外报外刊，最多的时候达70多种。

我到印度研究室虽然担任副主任（主任是校长温建平兼任，另一副主任是赵卫邦教授）主持日常工作，但是有时学校又抽调我出去搞中心工作，且后来我还兼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因此不能全身心地长期坚持学术研究和考虑研究室的建设。总之，我很抱歉，我做的工作少，没有为印度研究室和后来的南亚研究所的业务建设和学术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如果说对我们室（和后来的所）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和我们最初的“刊物”——《印度研究资料》——的创办上。

在研究方向上，当时国内在外国问题领域普遍存在研究历史的多而研究现实的少的情况，而如果不以现实研究为主的话，我们又怎么能为现实的需要服务呢？我们的研究要站得住脚，就要为现实服务，要紧紧围绕现实问题开展研究。

在研究领域方面，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有外交部和中联部的研究机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主抓，这是他们的强项，我们不能与人家相比，而经济当时还是个冷门，我们就应该从印度的现实经济问题入手。事实证明我们这一战略选择——请允许我把它叫作“战略选择”——选对了。

由于正确地选择了研究方向，我们的研究适应了后来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在初创时期就出了许多得到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和同行肯定的成果。

1972年，应国家有关部门的要求，印度研究室在停止研究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6年之久后恢复工作。一恢复研究工作，应有关部门的需要，我们就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由尹协祚同志执笔撰写了《印度的基本情况》一书。这是一本为我国国防建设服务的基础性参考材料，直接供国家有关部门参考，其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提出有关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的课题，要求在短期内拿出成果来，世经所便把这一任务转交给我们。我们按时完成了这一任务，撰写了题目为“印度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的研究报告。据社科院世经所的同志讲，他们将我们的成果一字不改地转呈总理办公室，并被登在有关的内参上。

不久以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所等13个单位联合编辑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参考的内部刊物《世界经济调研》，邀请我们供稿。我们撰写了12篇调查报告陆续在该刊物上登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李德昌同志的关于“中、印能源发展比较”、雷启淮同志的关于“印度发展农业的经验教训”、曾向东同志的关于“印度发展机械工业的经验教训”和何承金同志的关于“印度工程出口的经验”等文。这些文章得到了上述主办单位的好评，特别是曾向东同志撰写的关于“印度发展机械工业的经验教训”一文受到中央有关领导人的重视，其在文中做了若干圈点和旁批。

1982年，在大量搜集资料和精心准备的基础上，李了文等同志编写了《印度经济》（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是我国建国后第一本全面介绍印度经济的专著，获1984年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

此外，1974年我们还集体撰写了“从旁遮普邦看印度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一文，作为当年10月由中共中央联络部组织召开、全国有关印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供国家重大决策参考的研讨会的重要参考文件之一；20世纪80年代初，应国家教委要求，我们撰写了“印度高等教育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和“印度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等两篇调研报告；1982年，参加国家农委和全

国农业区划办组织的“外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印度农业发展战略的转移”等数篇文章，等等。

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些成果得到各方面的好评，为我们赢得了声誉，使我们在外国问题研究界站稳了脚跟，也为我们培养了一支比较强的学术研究队伍，为后来南亚研究所的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创办刊物上，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国问题研究刊物稀缺，更不容易申请批准创办这方面的正式公开发行刊物，因此我主张搞一本不定期的资料性质的内部交流刊物，作为我们的研究阵地，反映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与国内同行和政府有关部门交流。这本叫《印度研究资料》的非正式刊物对于我们初期的研究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同行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欢迎，也为我们后来主办公开发行的正式期刊《南亚研究季刊》打下了基础，为能申请到正式的学术期刊刊号奠定了基础。我为《印度研究资料》付出了心血，亲自把关，每期的每一篇文章都一字一句过目。

回顾南亚研究所的初创时期，物质条件是差的，但是当时我们全体研究人员都热爱这项工作，有敬业精神和静下心来做研究的心性，团结奋斗，因此我们的印度研究室不但没有垮，而且还硕果累累。这是我感到无比欣慰的。

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庆祝 南亚研究所成立50周年

雷启淮

在南亚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之际，作为整个一生黄金时期都在南亚研究所度过的研究者，我有责任和义务将南亚研究所在 20 世纪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点滴，予以钩沉。

—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指示，1963 年下半年，高教部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 17 所高校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其中四川大学建立印度研究室，但并未提及研究的领域和范围。1964 年 8 月，印度研究室成立后，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地缘特点，在彭盛琪副主任的领导下，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最后确定为研究印度的经济政治现状。1979 年 9 月 6 日我校向国家教委请示，“当年 9 月将印度研究室扩建为南亚研究所”。教委批复中明确指出，南亚研究所的宗旨是以研究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现状为主，兼及历史”。编制为 52 人。

我们遵循这个研究的大方向，在制定规划和提出研究课题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以基础研究为主，从战略上配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的背景研究成果，为其制定政策决策时提供参考。

（一）重视现状研究，主动适应社会需要

印度研究室刚成立不到半年，1965 年 4 月尹协祚老师执笔写出了第一份调

查报告“印度的粮食危机”，上报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同志。

1972年，应我国有关部门的要求，印度研究室开始恢复因“文化大革命”而终止的研究工作，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印度的基本情况》，重点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以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直接为我国国防建设和战略任务服务。

1974年10月，在中联部的协同组织下，全国有关印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我国重大决策的讨论。事前印度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搜集整理了大量研究资料，还特意邀请了当时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的王德忠、杨晓航、刘成章等4位老师，在无任何报酬的情况下，长达数月之久，搜集翻译了大量资料，最后写出了“从旁遮普邦看印度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一文，提供大会讨论。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推荐，应国务院总理的要求，撰写了“印度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以后又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等13个单位编辑并主送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世界经济调研》撰写调研报告12篇，其中“印度发展机械工业的经验教训”一文，国家有关领导同志看后做了重要批示，转批有关部门参考。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对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行探索，应当时国家教委要求，我们提供了“印度高等教育值得探讨的几个问题”、“印度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两篇调研报告。

为配合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制定我国农业发展战略和2000年农业发展纲要，我们先后参加了中央有关部门布置的专题研究。1982年初，参加原国家农委、全国农业区划办部署的《外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我们提供了“印度农业发展战略的转移”、“印度广开农村就业的途径”、“印度农村能源现状及发展前景”和“印度西北部商品粮基地建设”等调研报告。1984年4月，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中国农村发展中心的委托，参加《国外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工商综合发展》的研究，提交了“印度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的转移”专题研究报告。1985年3月，配合我国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经济开发区这一基本国策，应全国农业区划办、国家计委农业区划局的要求，参加《沿海港口城市和开发区农业发展方向》的研究，我们提供了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印度加尔各答和孟买港口城市农业发展方向三篇专题研究报告。1986年初，为加强我国城乡土地管理，维护我国土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开发、保护和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国务院国家土地管理局组织有关单位力量，开展《国外和港台城乡土地管理现状》的研究，供国家决策时参考，我们提交了“印度城乡土地管理”的

研究报告。为配合我国对农产品价格调整的需要，1987 年 2 月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下达研究《世界农产品价格机制和对策》的任务，我们完成了“印度农产品价格机制和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的研究报告。1988 年 12 月，为了促进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研究《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提供了“印度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的研究报告。

我国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关系，1988 年应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要求，撰写了“扩大中印经贸关系，开辟印度市场前景”的研究报告。为了积极利用外国资金为我国农业发展服务，1989 年 9 月农业发展战略中心委托研究《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发展农业》，我们提供了“印度利用外资发展农业”的专题报告。1991 年底，四川省为了拓宽对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省委组织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研究，我们同外贸系的同志一道，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科技状况及其与四川的互补性和市场前景”进行研究，1992 年 7 月提交了研究报告。1994 年 6 月，四川省政府召开“四川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大型讨论会，我们提交了“四川与西南沿边沿海省区联合对南亚开放的探讨”、“拓展四川和南亚贸易前景分析”和“国外内陆地区开发、开放的国际比较”（同外贸系）3 篇论文。

1999 年初，应成都军区有关部门开展国防教育的需要，我们提供了印度政治实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社会变化 4 篇调查报告。

（二）办好学术刊物，促进基础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学术园地对于科研成果的体现、研究人员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们就不定期编辑发行了一系列内部资料，先后编辑了《印度问题研究参考资料》、《印度研究资料》、《印度报刊摘译》、《印度统计资料》和《南亚研究资料》，共 37 期。这些内部交流资料虽然显得极不正规和粗糙，但是它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现状和创办学术刊物的雏形。

1984 年初，成功申请批准出版《南亚研究季刊》，公开发行。经过一年试刊，1985 年正式出版发行。

《南亚研究季刊》的办刊宗旨仍以刊登南亚国家的经济政治现状为主，兼及历史和社会文化的研究论文和资料。

该刊自创刊以来，严格按照新闻出版部门的要求，遵循办刊宗旨，严格把

关,保证刊物的质量和学术水平。但是,在创刊初期有各种流言蜚语,说什么自己办的刊物刊登自己人的文章,没有什么水平。当然,有没有水平并非某几个人说了算。实际上,我们按照统一的办刊标准,严格审稿程序,内外稿一视同仁。据统计,从1985年第一期到2002年第一期(包括1998年增刊),共发行70期,刊登文章808篇。其中,内稿438篇;占总数的54.22%;外稿370篇,占总数的45.78%。内稿略多于外稿,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研究南亚问题的专门机构。在外稿中,不乏国内著名南亚学者和专家向本刊投来的稿件,从而保证了刊物的质量和学术水平。在808篇文章中,经济政治现状,包括军事和对外关系的文章共573篇,占总数的70.91%,完全符合我们的办刊宗旨,使刊物的质量不断提高,成为全国的核心刊物。

但是,在办刊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在欲哭无泪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赵卫邦教授带信来叫我去一下,他对我说:“雷同志不用愁办季刊的经费,以后可以解决的。”不久,老先生病情加重,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将其辛勤耕耘一生的家产的2/3捐赠给南亚研究所办《南亚研究季刊》。中间虽然出了点问题,但有幸的是《南亚研究季刊》终于继续办下去了。为了纪念他,我们搜集、整理了他的文章,编辑出版了《赵卫邦文存》(上、下册)。在南亚研究所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将永远记住赵卫邦这个名字。

我做《南亚研究季刊》主编期间,非常看重它,珍惜它的来之不易,倾注了不少精力。凡是刊登在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从选稿、定稿到终审,我都至少要看一遍以上,虽然在政治大方向上未发现问题,但是在编辑校对中仍发现不少问题。我记得有一期,由于责任编辑疏忽和马虎,校对错误太多,除了重印外,主编、副主编和责任编辑都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南亚研究季刊》对南亚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科研团队的形成与成长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殷切地希望后继者珍惜它,爱护它,使它办得越来越好。

(三) 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提高学术水平

在印度研究室成立不久,作为副主任的赵卫邦教授就经常给我们做学术报告,讲述印度古代的土地制度、种姓制度和甘地非暴力主义等,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加深了对印度基本情况的了解。

1980年11月,受中国南亚学会的委托,我们承办《印度社会性质》学术讨论会。这是我们承办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准备较充分,讨论热烈,从各

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印度，大家一致认为“两论”所述印度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印度应该是具有某些特性的、发展较慢的资本主义国家。

1987 年 8 月，由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合作主办的《第三世界国家农村经济问题学术讨论会》，由我们承办。这次讨论会规模较大，与会专家学者较多，内容涉及第三世界主要国家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力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和所面临的问题。

1992 年 5 月，由中国南亚学会主办，我所承办的《南亚形势与印度内外政策》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70 多位南亚学者专家喜聚蓉城，就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与印度经济改革和外交政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1994 年 10 月，受中国南亚学会委托，我所承办的《南亚国家政策走向》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会议就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自 1985 年 12 月诞生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998 年 10 月，来自全国南亚学界近 70 位专家学者于成都召开了“印度综合国力”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中国南亚学会主办，四川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承办，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成都军区二部、成都 56279 部队和四川国际友好联络会协办。会议就印度的国际影响力、政治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并与我国进行了比较。

通过承办这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我们的研究人员有更多的机会和南亚研究同仁广交朋友，进行学术交流，从而提高了学术水平和研究能力。

二

印度研究室当时是我校文科唯一的研究机构，既神秘又受宠，不挂牌子，直属校长办公室，由校长温建平兼主任，原化学系总支书记彭盛琪同志和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赵卫邦担任副主任，除调来历史系亚洲史教研室副主任尹协祚老师作为学术骨干外，其余就是从哲学系、经济系和历史系留下的 4 名应届本科毕业生。

当时，我们名为专职科研人员，实际上既是清洁工、搬运工又是学生。

在东风南楼分给了我们两间大屋子，这就是我们的办公室，屋内除到处是垃

圾、灰尘、蜘蛛网和破碎玻璃外，其余一无所有。

我们从打扫屋子，修窗户做起，又搬回配给我们的家具后，就开始了漫长的搬运工和学生生活。

我们新参加工作的4人中，除1人读书时学的英语、去参加农村“四清”外，其余3人，还包括尹协祚老师以前学的均是俄语，而英语成了我们工作的“拦路虎”。因此，彭副主任给我们（包括他本人）制定了严密的英语学习计划。每天上班的前1个小时集体学习英语，规定每天必须熟记10个单词。同时，安排我们到外文系跟班学习，直到“文革”前夕学校停课。

这段时间，除学习英语外，就是到图书馆搬回分给我们的图书和报刊。搬回这些图书资料并整理上架就是我们的任务，这项工作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随后就是每隔几天搬回分配给我们的图书。

此前，在印度研究室筹建期间，赵卫邦先生和尹协祚老师还选订了大量图书并征订1965年度英文报刊55种。除“文革”中1970年脱订外，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才逐渐压缩。

想当初，我们单纯活泼，只管干，无任何思想负担。固定经费学校包干，每年还拨活动经费1万元，非常充足，根本用不完，还支援其他单位。

基本白手起家的印度研究室发展成如今知天命的南亚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实在来之不易，应该珍惜。

我在南亚研究所生活工作了几十个春秋，感受颇深，有几点体会：

（一）立足于实干

南亚研究所是实干起家的，其总体优势就是有那么一帮脚踏实地能干实事的人。不管是东风南楼、东风二栋顶楼，还是滨江楼一楼，无论是寒暑假还是其他节假日，大多数时间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那就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在那儿埋头学习和工作，这在学校当时是少有的。

在东风二栋顶楼的一间最小的屋子里，不管是刮风下雨的晚上还是举家欢庆的节假日，都坐着一老一少在那儿孜孜不倦地工作和学习，那就是李了文父子。李了文同志的工作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他治学严谨，对印度政局研究造诣颇深，却不幸英年早逝。在他生病期间，我出差北京，要我带回他喜欢吃的北京粉丝，我未做到。看着他失望的表情，我心里十分难受，不久他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至今我愧疚犹存。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环境下，南亚所大多数研究人员未受到干扰和

冲击，潜心于研究工作，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有关方面的重视，逐渐形成了总体优势。说实话，就个体研究力量来讲，我们在国内排不上队；就整体研究力量而言，我们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的特点就是立足于实干，在制订科研计划和组织课题时，都把重担加在年轻研究人员身上。从 1988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承担的 5 项国家（中华）社科基金项目 and 7 项国家教委社科基金项目，几乎涵盖了所有研究人员，逐渐形成了一个来之能战的科研团队。

1987 年美国南亚考察团访问我所时，称南亚研究所是“一个严肃的学术机构”，就是指我们是个老中青结合、学术气氛活跃的战斗团队。

南亚研究所应该是一支强大的研究队伍，可是到我退休时，也只有十多个人。为南亚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有 10 人离开了我们；因种种原因从南亚研究所调出的 17 人中，很多都成为调入单位的学术骨干或领导。他们都为南亚研究所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二）排难求生存

南亚研究所并非一直是成立初期的“宠儿”，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初期，几乎成为无娘照顾的“流浪儿”。

自生自灭，自求生存，无任何经费来源。当时摆在南亚研究所面前的两大困难是：出版《南亚研究季刊》和订购外报外刊经费全无。

赵卫邦先生的捐赠总算解决了办刊问题，同时又是南亚研究所经费的来源。在订购外报外刊时，虽然经过精选，一砍再砍，从 1979 年的 86 种减到 1988 年的 46 种，再压缩到 1992 年的 17 种，经费依然短缺，不得不动用个别同志的课题经费，总算渡过了难关。

但是，这段时间真是苦了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文社科院下的几个研究所都是学校最穷的单位，每月为数甚少的基本奖金都难以兑现，更不说其他福利了。但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并未因此而贻误工作，真是难能可贵。

在我们处境极端困难的时候，兄弟单位的支持起了很大作用。要不是成都军区有关部门资助，我们编写的《当代南亚丛书》是不可能面世的，谨致谢意！

（三）狠狠抓特色

南亚研究所研究南亚国家经济现状为特色。抓住这个特色，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为国家有关实际工作部门所看重。说实话，没有这个特色，很多研究课题

是轮不到我们的，别人也不会找上门来。我们正因为尝到了这个甜头，狠狠抓住这个大方向不放，才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提供了一系列研究参考资料，为制定政策决策时参考。

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学术界有些人认为搞现实问题研究没有学术价值，我们却认为并非如此，有用就是有价值，仍坚持这个大方向。当时，马洪同志说，研究现实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这样更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因此，在组织研究课题时，根据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需要，我们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急需的课题摆在最优先的地位。

在改革开放中，国内的几个南亚研究所纷纷扩容升级，扩大研究地区和范围，削弱了研究南亚的实力。我们没有赶这个潮流，是当时国内存在的唯一南亚研究所，如果我们丢掉了这块牌子，印度驻华使馆说不定就不会找我们协作编写《中印经贸手册》了，四川省信息中心也不会把我们作为南亚，特别是印度经济的数据库和采集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认准的东西，就要坚持下去，最终是会有好处的。

三

在南亚研究所发展的过程中，彭盛琪同志一直关心南亚研究所（印度研究室）的工作，不管是“四清”时回化学系，还是“文革”中后期担任学校机关主要领导人，只要有空就要回来看视。在担任副校长后，他仍心系南亚研究所的工作。

我曾在南亚研究所主持了一段时间的工作，虽然还算勤奋，主观上也想把工作搞好，客观上却并非令人满意，甚至在工作中还伤害了个别同志，深表歉意！

但是，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正确领导和扶持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和帮助下，全所同志齐心协力，辛勤劳动，总算搭建起了一个研究平台，希望后继者在此平台上奋勇前进，再创辉煌。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挽救了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文富德

上大学前长期从事中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经历，使我对行政工作产生了厌倦。因此，1981年12月从四川大学政治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我没有选择到行政部门工作，而是来到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领导安排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跑印刷厂，当研究生辅导员，晚上照看生病住院的赵卫邦先生等。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与全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样，90年代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为此，四川联合大学把南亚研究所、宗教研究所、人口研究所和古迹整理所等4个教育部批准建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结合在一起，成立协调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并于1996年1月任命我担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当时我曾经提出，如果是实体性学院，我则不愿当这个副院长。由于这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是不挣钱的经济困难单位，1998年7月学校解散成立不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并按照“肥瘦搭配”的原则，把南亚研究所划入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南亚研究所从过去与院系平行的处级单位降成了教研室。我本想回到南亚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学校却任命我为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分管学院科研和各科研单位的工作。同时，学院任命陈继东同志为南亚研究所所长。1999年，为了挽救处于困境之中的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教育部开展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并明确规定重点研究基地与院系平行，为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单位。我本不愿在南亚研究所担任什么职务，但1999年5月学校安排我兼任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为了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抓住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的机遇，使南亚研究所走出困境，我不情愿地接受了学校的安排，并表示，南亚研究所批准为重点研究基地后，就请学校另找人当所长。同时，学校安排陈继东教授为南亚研究所副所长。经过1年多的艰苦努力，经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家评审组的评

审，2000年10月教育部批准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为重点研究基地。之后不久，我正式提出辞去所长职务的申请，但学校方面的答复是，等检查验收合格后再说。从此，我只好履行基地主任职责，开始按照教育部关于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要求，在我所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2004年7月我所顺利通过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专家评审组的评审，学校也增加了对重点研究基地的资助。我认为，南亚研究所最困难的时间过去了，南亚研究所不会垮了，于是再次正式提出辞去所长职务的申请，但得到的答复是，学校将考虑给我安排一个助手。无奈，考虑到陈继东教授已经借调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工作，我只好继续带领南亚研究所进入重点研究基地第二阶段建设工作，并等待学校的安排。2006年11月1日，学校在我所召开职工大会，宣布免去我的南亚研究所所长职务和陈继东教授的副所长职务，并任命李涛教授为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从此，我终于解脱了。作为一个科研人员，我可以安心地从事南亚研究工作了。因此，这里，我要讲的主要是南亚研究所1999年5月到2006年10月期间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即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在我看来，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挽救了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一、科研工作危机重重

20世纪末期，与全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一样，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面临科研经费严重短缺，科研人员收入低下，科研人员人心涣散，科研人员不断减少，科研成果逐渐下滑等诸多问题，科研工作陷入重重危机之中。

（一）科研经费严重短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南亚研究所就没有了国家财政下拨的科研单位事业费，连买个笔记本的钱都没有了。同时，经济改革以来，外报外刊的价格不断上涨，迫使我所逐渐减少每年订阅外国报刊的数量。到1999年，我所只订阅了14种外报外刊。此外，随着物价迅速上涨，我所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南亚研究季刊》所需费用迅速增加。而到1999年，从1985年起就开始使用的赵卫邦先生捐赠的10万元《南亚研究季刊》办刊资金已告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机

构，我们科研经费严重短缺，没有了基本的科研事业费，也没有了外报外刊订阅费和学术期刊运转费，甚至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二）科研人员收入低下

经济改革以来，科研人员工资收入也有大幅度提高，大多数人的工资从几十元上涨到几百元。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拥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工资也上涨至 1000 元以上。但是，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先后开始的住房改革、高等教育收费改革和医疗自费改革，使收入本来就不高的科研人员一下子感到压力剧增。校内其他有收入的单位不断增加职工收入，而作为科研单位，我们没有增加收入的渠道，甚至连政府规定发放的物价补贴，学校由于经费困难只给这些没有收入的单位 70%，并要求我们这些单位承担 30% 的补贴。科研人员与其他有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更不要说与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又一部分先后富裕起来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了。

（三）科研人员人心涣散

与学校其他有收入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以及与社会上一部分人又一部分人先后富裕起来人的收入差距更大的社会环境，加之住房改革、教育收费改革和医疗自费改革等造成的巨大压力，形成了一个极为不利的科研环境。这不能不导致科研人员认真思考自己该怎么办的问题，也不能不导致一些科研人员人心涣散。有的科研人员开始从事非科研工作。大家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怎么炒股，怎么赚钱。市场经济已经逐渐渗透到科研单位，渗透到每个科研人员身上。

（四）科研人员不断减少

不利的科研环境，不仅导致一些科研人员人心涣散，而且导致一些科研人员选择放弃科研工作，改行从事教学和其他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除了出国留学人员没有回来外，我所科研人员改行从事其他工作的情况不断发生。甚至连唯一一个来我所工作的博士，也申请转到了学校其他单位。到 1999 年底学校开展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定编定员工作时，在我所工作的各类人员实际上只有 12 人。其中，行政和图书资料人员 3 人，刚到所工作不久的科研人员 2 人，即将退